

◆ 郭 锋 著 ◆

唐代 士族 个案 研究

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



厦
门
大
学
出
版
社

唐代士族 个案研究

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

郭 锋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唐代士族个案研究

——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为中心

郭 锋 著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三明地质印刷厂印刷

(地址:三明市富兴路15号 邮编:365001)

*

开本 850×1168 1/32 7印张 7插页 172千字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 7-5615-1476-X/K·246

定价:15.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引言	(1)
一、对晋唐士族的几点认识	(1)
二、学术史回顾	(5)
三、以张氏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及材料的使用	(8)
四、理论方法	(15)
第一章 汉唐张氏社会发展概况	(20)
第一节 汉以前张氏的社会发展	(20)
第二节 汉迄唐张氏社会活跃程度	(27)
第三节 汉唐张氏地域分布	(35)
第四节 汉唐张氏社会人口发展比例	(38)
第二章 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郡望的形成	(44)
第一节 史籍谱表材料所见晋唐张氏之郡望	(44)
第二节 吴郡张氏郡望形成史考察	(48)
第三节 范阳张氏	(51)
第四节 清河张氏	(56)
第五节 敦煌张氏	(60)
第六节 郡望形成与士族标准之关系	(63)
第三章 旧族与新门: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	
入唐族支考察	(65)
第一节 南北朝末期、隋唐之际的政治社会变化	(65)
第二节 吴郡张氏入唐族支——张后胤支世系考	(68)

第三节	清河张氏入唐族支——张文瓘支世系考	…… (76)
第四节	敦煌张氏张公瑾支	…… (78)
第五节	范阳张氏入唐族支(张柬之、张九龄、 张嘉贞、张说、张去奢诸支)世系及与 前朝关系考辨	…… (81)
第六节	从张氏旧族新门看隋唐之际士族变动	…… (91)
第四章	政治升沉: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之仕宦	…… (93)
第一节	唐代张氏诸望仕宦人物比例分析	…… (94)
第二节	旧族的场合——张后胤、张文瓘、张公瑾、 张去奢家族	…… (96)
第三节	新门的场合——张柬之、张延赏、张说、 张九龄家族	…… (106)
第四节	张氏旧族新门政治兴衰与唐代士族 兴衰历程	…… (115)
第五章	社会荣衰:唐代张氏旧族新门之社会史	
	内容考察	…… (120)
第一节	家族家庭类型	…… (120)
第二节	婚姻关系	…… (129)
第三节	家族维系的主要形式	…… (144)
第四节	家学	…… (149)
第五节	家庭人口	…… (157)
第六章	影响唐代张氏士族兴衰的政治社会因素	…… (162)
第一节	脱离政治社会的过程及自身原因	…… (163)
第二节	社会政治变化的影响因素	…… (171)
第三节	经济变化因素	…… (175)
第七章	郡望向姓望转化与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终结	
	——以清河张氏成为同姓共望为例	…… (179)

第一节	谱系所见张氏郡望的升降增减与清河望的社会影响.....	(180)
第二节	从墓志材料看清河一望成为张氏姓望的历史过程.....	(191)
结 语	(202)
Introduction	(208)
后 记	(214)

引言

本文探讨晋唐时期活跃于政治社会中的几个张姓士族家族——吴郡张氏、清河张氏、范阳张氏和敦煌张氏的政治社会兴衰历史。通过这一探讨，期望能从个案实例的角度，对晋唐时期士族政治社会运动的不同发展特点，尤其是进入唐代以后，士族阶层的存在方式、活动状况、与政治社会的相互作用及兴衰过程等问题有所揭示。

一、对晋唐士族的几点认识

士族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晋唐这一历史时期独有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

士族一词，单从字义上看，是一种业缘概念，指封建社会官、民划分中官这一阶层，或者士、农、工、商四民划分中的士这一阶层。在这一层意义上，“士族”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先秦迄明清常见的“士大夫”、“士流”、“士绅”、“官族”、“宦族”、“官宦”、“官绅”等概念大致上是相近的，即都是指官这一阶层。

但是，在晋唐时期，士族一词除了业缘概念以外，还含有血缘家族概念和政治等级概念。后两个概念的意义甚至更为重要。不是不论什么人，只要入仕为官，其人其家都可被称为士族的。晋唐时期，只有那些自某一代入仕以官为业后，家族成员累世仕宦不

断,且起码三世内世世有人做官达到一定品级以上(五品以上),本人及家族成员均享有用荫、免役等特权的个人及家族,才够得上称为士族。也就是说,士族一词具有官、血缘家世和官品等级三位一体的法定规定性,实际上是专指官这一业缘阶层中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特定的家族。从阶级分析的观点看,也可以说,士族只是整个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及家族,一部分由于世代与政治社会结合比较紧且达于一定高位,而与普通官僚地主在等级及权力分配关系上有明显差别的人及家族。由于家族成员以官为业,士族之家也常称为“仕族”。又由于累世仕宦,士族也被称为世族。有些士族家族,家族成员入仕到高位者多,社会政治影响力大,具有强烈的精神优势,其家风礼法甚至出身籍贯、姓氏标志、都成为社会崇尚的对象,家族成员门第等级优越感极强,这样的士族家族,社会上常称之为大族、名族、望族、甲族或门阀士族。另外,晋唐时期政治社会中一个突出现象是,在统治阶级官僚队伍构成中,累世仕宦家族出身的官员比例一直高于单寒家庭官员(一代或二代入仕,后代退入农的阶层中,不再入仕者)的比例。一个官员,若看其出身、家世,三~五代皆有仕宦是常事,甚至具有八九世至十数世仕宦不歇的家世仕宦历史的官员也大有人在,也就是说,其家族累世仕宦,历经朝代更替而不随着一朝一代的垮台而退出官场。这样的官员及家族则被称为旧族。

士族形成于魏晋,兴盛于南北朝,衰亡于唐。士族这一政治社会力量的活动,使中国封建社会晋唐时期历史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随着士族等级的形成和作用于政治社会,晋唐时期的政治体制及运行方式与秦汉相比,发生了变化。变化显著之点,一为政治制度上,由“三公开府制”向台省制度转变。台省制度始肇于两汉,初成于魏晋,几乎与士族出现于历史舞台同时发生,经过晋南北朝的游移,至隋唐前期定型,唐后期再发生变化。而这整个由形

成到游移到定型的转变过程，是始终与士族兴衰有联系的。士族这一政治现象，在台省制度的形成、游移、定型与转变过程中起着明显作用。

二是官吏选举使用上，由辟举制向科举制转变。秦汉时期官吏选用是地方公府辟举制。魏晋开始发生变化，实行九品中正制，出现官吏选拔上地方荐举与中央任免相结合的过渡形式，用人权逐渐向中央过渡。至隋唐时期，以科举制为代表，官吏选拔由地方、中央二因素结合转变为取消地方用人权，全国县尉、主簿以上官吏统一由中央任免使用。这一变化，实际上也是随着士族这一社会力量的出现与成长而发生、发展的。士族的政治社会活动，在这一变化发生发展中有着重要影响。

其次，随着士族等级的形成及作用于政治社会，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及运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是阶级关系的变化。最突出的表现是以士族的活动为主要形式，地主阶级与政治结合程度日密，社会阶级对立由秦汉时期地方豪族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包括自耕农与佃客）直接对立转变为官僚地主一体化的士族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直接对立。同时，由于士族地主的活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分化，日益官僚化的士族地主与离政治较远的普通地主围绕着权力分配，在争取社会政治经济权力上形成了矛盾和斗争（晋唐历史上也称之谓士、庶之争或身份性地主与非身份性地主之争）。

二是经济制度的变化，以田制和赋税课役制度为中心。田制上，晋唐时期，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独有的几种国家干预土地色彩强烈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屯田、占田和均田制。这几种土地所有制的发生、发展、消亡，恰与士族这一社会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衰亡相始终，占田、均田盛于晋至唐前期，以唐后期两税法的出现为标志告终。这一段历史时期，也恰是士族的鼎盛期，士族的活动，必然与之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晋唐士族的兴

衰,是建立在占田和均田这一经济背景之上的,占田、均田的出现和行用,是士族这一社会政治力量依靠政治争取经济权力的结果,体现了士族阶层的利益。赋税课役制度上,晋唐时期的种种举措,从晋南北朝的户调制、荫客制,到隋唐时期的租庸调制,也处处体现了士族这一社会政治力量的影响和作用,最终表现为对士族阶层的荫户、荫客、免役、占田数与课税数极不成比例等种种照顾。而以两税法出现,取消对士族地主免课税特权为标志,标志着士族政治社会影响的衰落。可以说,晋唐赋役课税制度的变化,也是与士族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次,随着士族等级的形成和作用于社会,晋唐社会在社会政治生活价值取向上,也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主要表现可举出地主阶级社会生活方式出现地方社会为主→城市生活为主到城市化→再地方化两个大变迁过程,及社会意识上出现以“尚姓观念”为代表的社会价值取向变化两个方面。

尚姓观念上,由于士族这一社会政治力量的活动,姓氏有等级之别,高下之分,门第和郡望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共同崇尚,并成为个人和家族普遍追求的目标,是晋唐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尚姓观念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东晋南朝、南北朝北魏及唐初,都出现了统治者以立法形式规定社会姓氏等级的事。晋唐历代国家立局修谱,甄别士庶,以为选官及官吏待遇依据,可以说一方面助长了尚姓观念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是受尚姓观念的影响的结果。在尚姓观念影响下的晋唐官僚政治,也呈现出重家世血缘关系,重门第阀阅的色彩,而与宋元明清相对来说是个人本位色彩的纯文官政治形成了对比。即使是唐后期科举逐渐发展成为选官主要形式时期,尚姓观念的影响依然强烈,由于士族阶层的活动和影响,唐后期的科举制原则上是取人不论出身,一律平等,实际上在具体执行中却有对具有门第家世优势的著姓士族子弟的照顾倾向,唐后期士族子弟及第比例一定时期内大于单寒出身士人比例,原因很多,

尚姓观念的影响作用也是其一，不可忽视。

再如，社会生活场所中，由于门阀士族这一社会力量的运动，晋唐时期出现了一个官僚阶层生活中心由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地方双家型向隋唐前期城市中心型及唐后期城市→地方新家型的大的转移过程。

晋南北朝时期处于分裂时期，战争多，朝代更替频繁，士族最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地方实力的基础。南朝士族也好，北朝士族也好，共同特点是家族立足于地方，家族生活以地方社会为主，进则进入各朝代官僚机构中，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退则在地方聚族自保，通过宗亲关系、经济实力和 cultural 优势，在地方社会形成影响。从存在与活动方式上看，如埃伯哈特所言，是处于城市→地方双家型。城市是主要活动场所，地方则是其施展政治影响的依托。

隋唐时期，全国统一为一盘棋，士族最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与再地方化（或如毛汉光所言，称之为中央化）。首先是隋至唐前期的城市化。这一时期的士族阶层，已逐渐脱离地方社会，把生活场所搬到城市中来，社会上形成一个城市型的以仕宦为业的家族阶层，地方社会不再为主要的关心对象，统一政权成为唯一关心目标，城市→地方双家型存在的生活方式逐渐让位于城市中心型存在的生活方式。唐中期开始，战争重新引起了社会变化，士族阶层的表现是再地方化。又呈两种方式，一是自中心城市向南方迁移形成新家；一是改变生活中心，原来仅是寄庄的地方庄园，成为士族子弟的主要生活场所。出现了一个以经营地方为主，城市官僚化因素为其施展影响的依托的变化。

士族的兴衰由此发生。未转入地方的士族，随着唐廷的灭亡而灭亡。一部分转入地方的士族后代，则退出了政治社会圈，重新成为地方社会成员，构成了宋地主宗族重建的前身之一。

总之，士族虽然只是整个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及特殊家族，

对晋唐政治社会影响却很大。

探讨晋唐社会的士族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晋唐社会的时代特征,进而把握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特点,社会价值取向变化等个人、家族、与国家、社会关系特点,乃至从政治社会学角度,更好地理解与把握历史与现代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以上是对晋唐士族的发展及作用总趋势的总体看法,诸点皆需具体论证。本文仅选取唐代社会这一段历史时期,通过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几支张氏旧族、新门在唐代活动的例证,看看唐代社会条件下,士族是如何活动、并与唐代社会前后期转变形成互相作用关系的。

二、学术史回顾

关于唐代士族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外学者发表的有关论著文章已有百篇之多。各论著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唐代士族的地位与作用等问题,其中中国大陆学者侧重于政治方面,对唐代士族的存在与否,士、庶之争及合流,地域集团之争,党派之争,士族衰落原因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是80年代以来,已有不少有深度的文章问世。^①港台学者以毛汉光、孙国栋、何启民、邱添生为代表,对唐代士族与统治阶层变动的关系、唐宋之际门第的消荣等问题做了细致论证。^②尤其是毛汉光先生的研究,涉及唐代大士族的进士第婚姻圈、中央化等问题,使学界对唐代士族有了进一步深入的了解。日本学者以守屋美都雄、矢野主税、竹田龙儿、爱宕元、励波护、池田温等人为代表,

① 请见章后注①。

② 请见章后注②。

对唐代士族作了显得较为细致的具体考证研究。^①其中竹田龙儿、池田温对唐敦煌出氏族郡望表作了深入研究,池田温还依据敦煌资料,对敦煌地方大族与政治社会关系作了考查,竹田龙儿则研究了唐代士族的家法。励波护考察了官制变化辟召制对士族衰亡的影响。英美学者以埃伯哈德、特威切特、艾伯莱、姜士彬等人代表也取得了一定成果。^②其中特威切特将唐代士族阶层与印度种姓集团作了比较,提出唐代存在一个类似印度种姓集团的阶层,但不是独立的经济阶层的说法。艾伯莱、姜士彬则首先开展了唐代士族的个案研究,分别讨论了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的兴衰与唐代士族兴衰的关系。

以上诸家研究成果,使有关唐代士族研究不断深化,是本文展

① 有关文章主要有:竹田龙儿《唐代士人的郡望》(《史学》24—4,1951年)、《贞观氏族志编纂有关问题的考察》(《史学》25—4,1952年),布目潮颯《唐初的贵族》(《东洋史研究》25卷1号,1948年),矢野主税《裴氏研究》(《社会科学论丛》14,1965年),宇都宫清吉《唐代贵族考察》(《史林》第19—3号,1934年),仁井田升《支那身份法史》(《东方文化学院刊》,1943年),今堀诚二《唐代士族的性格素描》(一)、(二)(《历史学研究》第九卷,1940年,第十卷,1941年),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丛刊》之(一),1956年),池田温《唐代的郡望表》(上)、(下)(《东洋学报》42—3、4号,1959—60年),《唐朝氏族志的一考察》(《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纪要》13—2,1965年),《八世纪初叶敦煌的氏族》(《东洋史研究》24—3,1967年),守屋美都雄《六朝门阀研究——太原王氏系谱考》(1951年),竹田龙儿《唐代士族的家法》(《史学》28—1,1955年),励波护《从牛李党争看中世贵族的崩溃和辟召制》(《东洋史研究》21—3,1962年),爱宕元《唐代官荫入仕研究——以卫官为中心》(《东洋史研究》35—2,1976年),《唐代范阳卢氏研究——婚姻关系》(《中国贵族志研究》,1987年)等。

② 有关文章主要有:Wolfram Eberhard《征服者与统治者:中世中国社会力量》(E. J. 布列尔出版公司,莱顿,1952年),特威切特《唐代统治阶级的结构——敦煌新资料为中心》(《唐代综观》,1973年),艾伯莱《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族——博陵崔氏个案研究》(剑桥,1978年),姜士彬(Davia Johnson):《一个大族的没落——唐末宋初赵郡李氏研究》(《哈佛亚洲研究杂志》37—1,1977年),《中国中世纪的贵族社会》(1976年)。

开研究唐代张氏的基础。

另外,关于张氏,学界也曾有论及,如矢野主税有《张氏研究》一文,副题为“张良家的历史”(本文未及见)。池田温《敦煌的大族》一文,对敦煌地方社会张氏的人口比例及活动有论述。还有人在讨论北朝政治历史时,提到清河张氏一支(张烈父子)的活动。北朝隋唐西州张氏,近年也有人做了初步探讨。^①但以一个姓氏为对象,对其各支望族加以综合考察,目前尚无所见。

三、以张氏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及材料的使用

张氏目前是全国第三大姓,据1987年公布的全国人口统计数字,全国姓氏人口的比例,前三姓为李、王、张。其中张姓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1987年5月3日《人民日报》)。

在地区性人口普查中,张也在前三姓左右。如1990年北京市一项人口调查数字表明,北京市人口中,王姓10.6%、李姓9.6%,张姓9.6%、刘姓7.7%。以上四姓人口总合,占北京市人口的1/3。(宁世高、宁来:《中国姓氏文化》,中国友谊出版社公司出版。)

中国社会中,流传着“张王李赵遍地刘”,“张王李赵刘,五姓遍

^① 有关张氏研究文章所见有:矢野主税《张氏研究稿——张良家的历史》(《长崎大学学术部社会科学论丛》第五,1950年)、《隋唐时代的上层乡邑社会》序章;《襄阳冢墓遗文》所见张柬之一族(《第一经大论集》7—3、4,1968年),池田温《八世纪初叶的敦煌氏族》第二节张氏(《东洋史研究》1966年24—3号),谷川道雄《六朝时代都市与农村对立关系研究——山东贵族居地以清河崔祖螭、张僧皓二族迁齐为例》(《中国都市与农村》,汲古书院,1992年),陈国灿《跋武周张怀寂墓志》(《文物》1981年1期),宋喜梅《西州高昌张氏家族仕宦》(《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3辑),林立平等《张九龄与唐代南北文化》(《学术研究》1992年第4期),藤枝晃《瓜沙归义军节度使始末》张议潮时期(1943年),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永丰乡人杂著》,1922年,收入《敦煌学文选》上集,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室编,1983年),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年),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张曹两世家考》(《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3辑)。

神州”的说法。

历史上张氏一姓自汉以来，也已是汉族中人口最多的少数几个姓氏之一。

一般来说，见于历史记载的姓氏人口分布应与实际社会当中姓氏的人口数多少成正比。人口多，总社会活跃度就高，见于记载的机率就比较大（出人物的机率相比要大一些）。

据此统计史籍中的姓氏分布，笔者看到，在《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晋书》、《隋书》、两唐书列传人物姓氏分布中，张姓人物的比例都很大，大致在前三位左右变化（见第一章讨论）。

居延汉简、吐鲁番文书和敦煌文书中有关名册、籍帐、差科簿的统计，张姓人物，官民合计，仍位居首列（见第一章讨论）。

由于是汉以来的全国人口大姓，研究唐代张氏人口中的阶级分布，张氏人物与政治社会的结合程度，张氏各阶层中个人、家族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在权力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具体地说，张氏士族家族与晋唐士族这一政治现象的关系，应该说是具有一定代表意义的。

这是以张姓为研究对象的第一个理由。

其次，历史上张氏一姓不仅人口上是大姓，在政治社会中的活跃程度也比较高，历代皆有有一定社会政治影响的政治文化人物。仅就唐代而言，政治人物上，张氏一姓达于宰相层次的有十七人。占唐代 98 姓 376 个宰相的 2.4%，位居第三。其中有影响的人物有张说、张文瓘、张柬之、张九龄、张嘉贞、张延赏、张镒、张潜等人。张说为开元名相，执权二十余年，对玄宗时期的各项举措建树颇大，为后世史学盛举为身系国家安危之人。张嘉贞、延赏、弘靖祖孙三代为相，其活动也影响着高武、玄宗、肃宗、代宗、德宗时期的政治社会活动。张九龄不仅是一代文宗，还作为南方文化的代表，关系到唐代中期以后南北文化的碰撞问题（见林立平文）。张潜唐昭宗朝为相，其活动涉及到唐末政治，且以其为朱全忠所杀为标

志，代表着唐末士族“清流”势力的完结，具有象征意义。其他政治人物，如张后胤，曾为太宗师，张公瑾，唐初创业功臣，张舟，宪宗安南都护，张齐丘、朔方节度，张仲方，宪、文党争重要人物之一，等等，皆属关系唐廷政局变化人物。

文化人物上，张说、张九龄之外，尚有诸多如张鹭（文成），作品时人誉为“张子之文如青钱，万拣万中”，号青钱学士；如张昌龄、张若虚、张志和、张仲方、张大素兄弟，张无择兄弟（“张氏五龙”），张旭、张遂（僧一行）、张继、张籍、张荐、张怀瓘、张彦远诸人，皆有业绩，或以文章，或以诗词，或以史学，或以书画，或以天文历法影响当代与后世。

即使地方社会中，唐代张氏也很活跃，如西州张怀寂家族、敦煌张议潮家族、范阳张允伸家族。张怀寂家族由高昌国官族转而效力唐廷，张议潮父子唐后期推翻吐蕃统治，以河西地归义朝廷，张允伸父子治范阳数十年，维持地方社会的发展，皆影响到唐廷政局的发展、变化及社会治乱。

这些人物的历史功过评说，暂且不论，单就与唐代士族关系而言，弄清其出身背景、家族关系、仕宦升沉，对于理解唐代士族阶层的构成，士族与政治社会关系，无疑也是有帮助的。这是以张氏为研究对象的又一理由。

再次，从姓氏与郡望关系上看，唐代姓氏存在着一姓数望与一姓单望的情况，刘、张诸姓属多望姓氏，崔、卢、李、郑、王、柳、裴、杜、韦、杨诸姓，基本上是一姓一望或二望，可归为单望姓氏。目前的研究多侧重于单望姓氏，如已有的赵郡李氏研究，博陵崔氏研究，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研究，兰陵萧氏研究及裴氏、颜氏研究等，而对于多望姓氏则研究者少。张氏在唐代，有十四望之称，甚至有四十三望的说法，而入宋以后，清河一望成为张氏唯一郡望，其他诸望消失不见，其中体现了士族与地方社会的关系，郡望对于姓氏发展的整合作用等问题。研究张氏多望的形成，消长过程，郡望虚

化过程,无疑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唐代郡望与士族的关系,弥补唐代士族研究这一方面的不足。这是以张氏为研究对象的又一理由。

另外,唐代士族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性是材料不足,现有的列传、杂史、墓志材料零散,家谱材料更是少见,目前所见明清族谱,追溯前朝的比例都很少,且多杂伪,这些都为研究唐代士族问题带来了困难。

而在现有材料中,张氏由于人口多,社会活跃度高,留下的记载也相对多一些,如以研究唐代士族的重要材料之一墓志而言,目前所见唐代墓志约有近 4000 块,涉及 18252 人次,318 姓,而其中张氏墓志数量位居第一,达 1800 人次,其次为王姓,1708 人次,李姓 1621 人次(据唐代墓志汇编所收统计)。

又如家谱材料,目前所见中国家谱截止 1984 年,大陆、台湾加上美国、日本收藏目录,总数有 15000 种左右(据常建华统计),其中张氏家谱,据核查为 5254 种,7402 部(另在 162 姓族谱姓氏分布比例统计中,占 698 种),居于诸家谱之首。

虽然大多数张氏谱为宋元至明清所修,但其中有少数张氏族谱系初修于宋代,以后历代续修,至明代通谱统修,内容上于唐代张氏若干支系的活动情况有反映,如著名的嘉靖继修《张氏统宗世谱》,就收录了唐前期开始吴郡张氏张后胤一支的谱系,清河张氏张文瓘一支的家世,以及曲江张九龄一系的家世谱系,其可信程度,从对曲江张九龄一支的分析看,大致是可信的,如该谱记载张九龄第九世后裔中有张锡、元吉二人,笔者在宋人笔记《燕翼诒谋录》看到这样一条记载:“真宗景德三年(1006),张公(九龄)九世孙元吉诣阙,献明皇墨迹并张公写真告身。仁宗天圣二年(1028),张公九世孙锡,又以告身来献。”^① 经对照,二人名字完全相符,辈份年代推算上也符合。这反映出,统宗世谱的收录,是有前代宋谱依

① 宋王《燕翼诒谋录》卷二。